

欺世盗名的“怪胎”

——揭露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的真面目



7月12日，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闹剧”宣告落幕。曲终人散，这个颇具争议的临时仲裁庭也就此退场，在国际法史上留下一段不光彩的印迹。

在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违反中菲共识、违反国际法，单方面强行推动的这起仲裁案中，临时仲裁庭扮演了恶劣而荒唐的角色。这个临时仲裁庭的一系列操作漏洞百出，几无公正权威可言。新华社记者通过采访调查，从机构组建、运行程序、人员构成、实体裁决等方面，揭示其假借“仲裁”之名违反国际法之实的本质。

非法无效的草台班子

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后，众多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纷纷以“联合国背景的仲裁庭作出裁决”、“常设仲裁庭作出裁决”等发布消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在海牙组建，属于因案而设、案终而撤的临时班子，绝不是“国际法庭”。记者采访调查发现，临时仲裁庭与同样位于海牙的国际法院(ICJ)没有任何关系，后者是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根据《联合国宪章》设立。

临时仲裁庭与位于德国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没有直接关系。唯一沾得上边的是，根据《公约》附件七的要求，如果当事方没有指定仲裁员，则由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在本案中为日本籍前庭长柳井俊二)代为指定。

临时仲裁庭与常设仲裁法院(PCA)也没有直接关系。略微有关的是，常设仲裁法庭为本案仲裁庭提供秘书服务，并将位于海牙的和平宫租借给仲裁庭作为庭审场所。

可见，本案临时仲裁庭，并不是常设仲裁机构，也不是国际海洋法领域的权威司法机关，其程序规则也是仲裁员拟定的，仅适用于本案的临时性仲裁规则。

为以正视听，北京时间13日晚间，国际法院在其官方网站首页发布提示信息称，国际法院希望媒体和公众注意，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由常设仲裁法院提供秘书服务下的一个特别仲裁庭作出。国际法院作为完全不同的另一机构，自始至终未曾参与该案。

联合国官方微博13日也发布声明称，常设仲裁法院与联合国没有任何关系。

从2013年以来，临时仲裁庭不顾中方反对，打着法治和规则旗号，一味接受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的非法无理主张，偏离了第三方程序应有的公正立场，随意扩权、滥权，强行作出所谓“裁决”，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仲裁庭不顾中方表达的严正立场，任意扩大管辖权，完全无视南海的历史和现实，曲解《公约》有关规定，从一开始就把《公约》这本经念歪了，其越权、扩权作出的非法裁决自然非法无效。仲裁庭代表不了国际法，更代表不了国际公平和正义。”国务委员杨洁篪14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这个仲裁庭完全是一个临时机构，它和其他国际权威司法机关没有任何正式关系。它不为裁决结果负责，也没有任何机构为这个仲裁庭背书。”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副院长孔令杰说。

随意轻率的组成程序

国际权威司法机关均有严格的组成程序。比如，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由《公约》缔约国大会选举，获得三分之二缔约国表决中三分之二票数，且该票数应为全体缔约国的过半数当选，庭长和副庭长由法庭选举产生；国际法院法官由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分别选举，法定参会人数过半数当选，法院院长和副院长由法官投票选举产生。

在组成人员方面，根据有关国际规则和国际司法实践，法官和仲裁员的选任应尽可能全面代表世界各个地区 and 不同法律体系。因此，国际法院由来自各大洲的15名法官组成，国际海洋法法庭更有多达21名法官。

反观南海仲裁案仲裁庭，首席仲裁员和仲裁员由指定和协商产生。仲裁庭法定成员为5人。根据《公约》附件七第8条规定，“仲裁庭裁决应以仲裁员的过半数票作出，不到半数的仲裁员缺席或弃权，应不妨碍仲裁庭作出裁决。”也就是说，以5名仲裁员为例，3名仲裁员参与投票即可作出裁决。

分析人士认为，少数仲裁员对案件包括证据在内的诸多方面拥有绝对控制和自由裁量权，把涉及重要海洋利益甚至是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交到多则5人、少则3人手中决定，显然轻率而无法接受。

“从实践中看，强制仲裁这种形式存在很大的缺陷，而这种缺陷在南海仲裁案中暴露无遗。”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说。

此外，在临时仲裁庭组建过程中，怪事连连，破绽不断。

在推选过程中，最初被任命的首席仲裁员、斯里兰卡前外交官平托，本来是唯一来自亚洲的仲裁员。然而，平托接受任命后即被发现其夫人持有菲律宾国籍，这违背了国际司法和诉讼中关于利益冲突和回避两项基本原则。更不可思议的是，平托辞职后不到三个星期，不在“名单”之列的加纳籍法官门萨就被指定为首席仲裁员。

这样，最终仲裁庭由4名欧洲籍仲裁员和长期居住欧洲的門萨构成。其中，德国籍沃尔夫鲁姆法官为菲律宾方指定，其余4人均由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日本籍法官柳井俊二代为指定，包括門萨和法国籍的科特、荷兰籍的松斯、波兰籍的帕夫拉克。其中帕夫拉克是柳井未与中方协商代为指定的中方仲裁员代表。

专家表示，南海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区域性的、高政治敏感度的重点海域纠纷。但仲裁庭中不仅没有亚洲籍仲裁员，而且从仲裁员背景看显然缺乏对南海问题、亚洲复杂的地缘政治以及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充分了解。

“仲裁庭人员构成代表性严重不足，无法实现全面、平衡，这使仲裁庭的公正性受到根本质疑。”孔令杰表示，整个仲裁庭的组成人员普遍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无法做到客观、独立的裁决。

破绽百出的所谓仲裁

然而，仅从最终确定的5人仲裁庭名单看，也有很多问题。

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下仲裁庭的“操盘手”——柳井俊二，他指定了本案大部分仲裁员。

据各项资料显示，柳井俊二是日本资深外交官，也是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

柳井长年担任安倍政府安保法制恳谈会会长职务。这一职务的实质就是安倍政府智囊团的首席。其个人政治立场非常明确。早在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任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柳井推动通过了日《联合国维和行动协力法》，让自卫队正式走向世界；2013年8月4日，在仲裁庭组建刚满1个月时，他以安保法制恳谈会会长身份参与日本NHK《星期日讨论》节目，并在节目中公开阐述政治立场，认为“日本”的岛屿受到“威胁”，强调日本存在在“敌人”，需要强化武力等多方面来“保障”日方安全。2014年5月，正是柳井将要求“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报告书交到日本首相安倍手中。柳井还曾于1999年任日本驻美大使，深得美方信任。2001年10月，他因牵涉滥用外务省机密费受到处分而丢官赔款，其“职业道德”亦令人怀疑。

专家表示，虽然根据《公约》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在特定情形下有权组建特设仲裁庭，但其政治背景和明显的政治倾向理应构成法定回避事由。

“由于日本与中国存在钓鱼岛争端，柳井俊二别谈兼顾考虑中方利益，就连保持起码的客观公正都不可能做到。”吴士存说。

另外，仲裁员当中，除代中方指定的帕夫拉克外，其余4人均作为其他仲裁案的仲裁员出席。其中門萨(5起)和沃尔夫鲁姆(3起)居多，門萨同时兼任三个仲裁庭首席仲裁员。

法律专家表示，这种充分参与的其他案件可能会产生严重影响，导致预设立场和预判结果的可能，一定程度上对仲裁庭的公正性造成减损。

以菲律宾指定的仲裁员沃尔夫鲁姆为例，据查证，其曾在2010年12月至2015年3月仲裁的查戈斯群岛案(毛里求斯诉英国)中担任仲裁员。

沃尔夫鲁姆在查戈斯群岛案中，发表署名的联名反对意见，明确否认、批驳了英国的主张——案件涉及岛屿主权问题，故而仲裁庭不具有管辖权——认为案件所涉主权问题不影响仲裁庭的管辖权。

此外，在“北极日出号”案(荷兰诉俄罗斯)中，沃尔夫鲁姆虽不是仲裁员，但与另一法官联名发布单独意见，强烈批评俄罗斯“不应诉”。分析认为，这也容易造成对“不应诉”立场形成固有成见。

孔令杰表示，临时仲裁庭仲裁员的背景有明显瑕疵。如沃尔夫鲁姆一直以来都比较激进，在过往案例中热衷于“造法”，即把海洋法公约上一些界定模糊的地方根据主观认识来完善补充。

仲裁庭人员构成代表性不足等种种问题，在国际海洋法法庭也引发争议。国际海洋法法庭前庭长、佛得角籍法官叶肃斯表示，他对4位仲裁员均来自欧洲深表关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籍法官卢次基曾在仲裁庭组成过程中致信柳井俊二，认为中国是被迫陷入仲裁程序。俄罗斯籍法官戈利钦表示同情中方在本案中的立场。

国际海洋法法庭前法官图尔克认为，临时仲裁庭来自欧洲的仲裁员明显偏多。“南海争端的本质是领土主权争端，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任何将涉及领土主权争端的政治问题包装成法律问题的做法都是自欺欺人。”

更为不严肃的是，个别仲裁员和专家证人在审理过程中出尔反尔，竟然推翻自己以往长期坚持的观点。

在2015年11月关于实体问题的庭

审中，菲律宾所请专家证人斯科菲尔德教授，一改以往其学术成果中称太平岛为“岛”的说法，在本案中将其定性为“礁”。斯科菲尔德还曾撰文指出，南沙群岛至少存在12个符合岛屿定义并可以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岛屿。然而在仲裁庭听证时，他却反口称南沙群岛没有一个岛礁可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还有，荷兰籍松斯教授曾长期主张，确定岛礁的法律地位是海洋划界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成为本案仲裁员后，这位教授一改过去的立场，反而认为岛礁法律地位的判定可以与海洋划界问题脱钩，从而为菲律宾恶意规避中方有关海洋划界的排除性声明背书。

有偿服务由谁买单

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1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仲裁庭5名仲裁员是挣钱的，挣的是菲律宾的钱，可能还有别人给他们的钱，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有偿服务的。

根据法律实践，一般而言，仲裁庭由双方协议组建，相关费用均摊。但在本案中，提供服务的常设仲裁法院秘书曾3次要求中菲缴纳费用，用于支付5名仲裁员薪酬、庭审房租等，维持仲裁庭正常运转。中国因不接受、不参与这一仲裁，一次也没有缴纳。菲律宾不仅缴纳了自己的份额，为了保证仲裁进行下去，还代替中国缴纳了中国的份额。据了解，仅在今年4月，菲律宾就向仲裁庭缴了85万欧元。

仲裁庭运转需要一笔巨额费用。据有关人士透露，本案仲裁员的薪酬高达每小时600欧元，如按每日工作8小时计算，仲裁员每日薪酬为4800欧元。另外，当事国双方还需缴纳启动资金50万欧元。仲裁程序相关的所有开销都应得到偿付，包括差旅费、住宿费、电话费、传真费、复印费等等。

目前关于仲裁案律师团队费用等，尚无公开资料可以查阅。初步核算，三年来仲裁案大概费用开支约为2600万欧元，约占2015年菲律宾财政收入预算的两千分之一。这也意味着，临时仲裁庭完全由菲律宾“包养”。

以上数字和菲律宾专栏作家里戈韦托·蒂格劳的说法相吻合。蒂格劳15日在《马尼拉时报》头版发表文章说，菲律宾为南海仲裁案请律师，共花费了3000万美元。并要求美国为此“买单”。

在政治操弄下，由阿基诺三世政府强行推进而达成“非法无效”裁决，惹起菲律宾国内的怨声。“他们(美国)在南海没有主权声索，也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仲裁案给了美国干预南海事务的借口，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者国务院应该给菲律宾报销这笔高昂的诉讼费和律师费。”蒂格劳说。

吴士存对此表示，与国际法院法官酬劳由联合国经费支付不同，临时仲裁庭仲裁员是明码标价、有偿服务。因中国不参与，因此整个案件所有费用完全由菲方承担，背后的猫腻不言自明。“仲裁庭也可以裁决自己没有管辖权，但如果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仲裁员们丢了自己的饭碗。”

事实再清楚不过了，南海仲裁案由始至终就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其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图谋。

文/新华社记者 李忠发 邹伟 臧晓程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雷锋家乡的共产党员们冲锋在前，是抗洪抢险一线的‘主心骨’和‘带头人’。”在抗洪抢险一线巡堤查险的湖南长沙市望城区委书记孔玉成动情地说。近一段时间，长沙市遭遇罕见暴雨袭击。一时间，大堤滑坡，管闸穿孔，多地告急……在危急时刻，望城区4万余名党员干部坚守在抗洪一线，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共产党员的担当。

7月4日，暴雨袭击了望城区铜官街道。受上游来水影响，望城辖区内彩陶溪水位迅速逼近距堤面40厘米处。在巨大的水压下，堤岸出现多处滑坡。这是一条直连湘江的撇洪渠，彩陶溪垮堤就于湘江垮堤。一旦溃堤，后果不堪设想。

当日一早，铜官街道800多名干部群众迅速上堤参与抗洪抢险。下午2时许，在彩陶溪水大桥地段，最严重的一处滑坡出现了，堤面三分之一崩塌，宽达十几米，溪内洪水急速朝石渚垸内管涌。接到报告后，街道副主任熊彪及防汛技术专家等迅速赶来，果断拿出抢险方案：在管涌处挖沟导渗。此时，管涌处已经烂泥成潭，灌水的堤身处于垮堤的边缘。

“党员带头先下堤。”有着14年党龄的熊彪用自身行动发出响亮的召唤。随后，正巧从另一处抢险现场赶来的街道主任、共产党员余款没有丝毫犹豫，带头与熊彪一起跳到堤下，30多名党员干部也跟着跳下去。经过近3个小时的冒雨奋战，险情终于得到控制。

湘江长沙段81公里，险在茶亭镇苏蓼垸。7月7日，尽管暴雨已停歇，但苏蓼垸湘江水位仍旧超过警戒水位1.4米。堤岸上，茶亭镇500多名党员干部和群众持续严防死守。

早晨6时30分许，巡堤员报告，鱼尾洲南堤突现管涌，水柱直径达2米，情况危急。

试探漏水点，6米长的竹竿插下去很快就没了顶。如要探查清楚，必须有人下水。“我们懂水性，也最熟悉这里，我们下去。”话音未落，两名老党员、55岁的苏蓼村主任余运龙和57岁的茶亭镇水管站站长姚跃辉就脱去了上衣，主动请缨。

下到水深1米处，余运龙突然感觉一股水流把自己往下吸，他连忙一把抓住身旁的姚跃辉，岸上人员及时抛下救生绳才使他们俩没被暗流吞没。30分钟后，在“蛙人”的帮助下，他们终于探到了漏点。3个多小时后，管涌被成功堵住。

在丁字湾街道的抗洪救灾前线，最耀眼的是高高飘扬在大堤上一面面鲜艳的党旗。社区党支部100余名党员主动请缨，参加抗洪抢险。9个党小组，9面党旗，迅速插在了9个责任堤段。

第四党小组的陈真，顶着暴雨烈日，七天六晚不下火线。他说，堤内就是父老乡亲，轮休时怎么也睡不踏实，坚守在大堤上才放心。

谭家巷堤段外滑坡抢险，党员周森林不顾泥泞，打桩、打沙袋，一直忙到晚上11时。险情控制住后，他又值守到第二天凌晨。几天的连续奋战，他的体力严重透支。

59岁的老党员叶振武，一直奋战在翻身垸……

抗洪抢险现场是党员干部的战场也是考场。长沙望城区4万余名党员干部正用实际行动争当“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先锋。

616万亩耕地纳入轮作休耕试点 将适时研究扩大试点规模

本报石家庄7月17日电 记者乔亮报道：农业部今天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推进落实会。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表示，按照有关试点方案，先期启动616万亩耕地轮作休耕试点，其中轮作试点500万亩、休耕试点116万亩。在东北冷凉区、北方农牧交错区开展轮作，在地下水漏斗区、重金属污染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开展休耕。今后3至5年，将适时研究扩大试点规模。

地下水漏斗区试点区域主要在严重干旱缺水的河北省黑龙港地下水漏斗区(沧州、衡水、邢台等地)。通过连续多年实施季节性休耕，实行“一季休耕、一季雨养”。

重金属污染区试点区域主要在湖南省长株潭重金属超标的重度污染区。在建立防护隔离带、阻控污染源的同时，采取施用石灰、种植绿肥、生物移除、重金属钝化等措施，修复治理污染耕地。

生态严重退化地区试点区域主要在西南石漠化区(贵州省、云南省)、西北生态严重退化地区(甘肃省)。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改种防风固沙、涵养水分、保护耕作层的植物，同时减少农事活动，促进生态环境改善。

余欣荣说，开展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要遵循一个前提，就是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影响农民收入为前提；做到两个坚持，就是坚持生态优先、综合治理，坚持轮作为主、休耕为辅；实现三个目标，就是探索耕地轮作休耕的技术模式、探索耕地轮作休耕的组织方式、探索耕地轮作休耕的政策体系，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轮作休耕制度积累经验。

丝绸之路拉力赛第七赛段结束 中国车手将回主场作战

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17日电 (记者韦骅 符晓波)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激烈争夺，2016丝绸之路拉力赛于16日结束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赛程，正式进入中国。在第七赛段也是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最后一个特殊赛段中，德普雷拿到赛段冠军。

在当天的比赛中，标致道达尔车队的法国车手德普雷以1小时2分44秒的成绩夺冠，他的队友勒布以2分46秒之差紧随其后，两人也同时占据总成绩榜的前两位。

中国车手在该赛段表现不俗，其中马森以1小时8分26秒的成绩拿到赛段第五，陈峰位列赛段第七。在总成绩榜上，吉利博越车队的韩魏以12小时53分52秒的成绩名列第六，在中国车手中队领跑。

打通“大动脉”，果农搭上电商顺风车

本报记者 刘畅



近日，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余湾乡韩店村，《经济日报》记者见到村民周有良时，他刚从自家苹果园回到家中。

站在他新建的农家小院内，周有良打开了话匣子。“余湾乡你们都没听说过吧，但说到静宁苹果，知道的人就多了。早些年，路不通，我们靠肩挑、担子扛，把苹果运到县里去卖，一折腾就是一整天。遇上刮风下雨耽误了时间，苹果就坏掉了。后来，村里的路慢慢变好了，我们就用‘三马子’(农用三轮车)一车接一车往外运，现在公路通到了家门口，一辆辆卡车开了进来，运苹果再也不用费劲了。”周有良说。

跨出周有良整洁的小院，一条村道相隔就是他家的苹果园。放眼望去，片片果园相连，不少果农顶着烈日在地

里施肥、剪枝。“苹果卖得好的农户，一年能赚10多万元。这些年，韩店村近60%的农户买了小汽车，人们的生活真正富起来了。”余湾乡韩店村的村民自豪地说。

“产业围绕公路走、公路围绕产业建”，这是本报记者此次赴宁夏、甘肃、四川等地调研时发现的一个规律。曾几何时，“路”是韩店村、余湾乡乃至整个静宁县发展的最大制约。如今，告别了过去坑坑洼洼、破落不堪的泥土路，一条条宽敞的公路成为村民们的“产业路”“致富路”。

在静宁县红六福果业有限公司的冷冻仓库外，工人们正在逐个挑选苹果，按照色泽、个头将苹果分装进价格不同的箱子。每天下午7点左右，一天的拣选结束，各家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开着小货车来到公司，将苹果逐箱码放整齐然后运走。第二天，这些富硒苹果就能到达全国各地的超市里。

“针对线上销售的苹果每盒售价最高

能达到198元，平均每天能卖出400多箱，销售旺季每天能卖出1000多箱。”红六福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伟告诉记者，村里的道路修通以后，苹果的销售周期更短，新鲜的苹果售价比以前提高了30%。

就在红六福果业有限公司大门旁，有一家近300平方米的“乡村电商体验馆”。王志伟向记者展示了通过淘宝网、微信商城、中国静宁苹果网等电商平台如何购买苹果。在北京、上海等地，红六福还开设了直营店，实现了线上线下两种销售渠道，真正拉近了田间到舌尖的距离。

四通八达的道路帮助静宁苹果打响名气，也为余湾乡带来了人气。2015年10月，静宁县首届苹果采摘体验节举行，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体验了采摘的乐趣，品尝了地道的静宁农家菜。嗅到了商机的余湾乡正着力打造“春赏花、夏消暑、秋摘果、冬赏雪”的苹果文化旅游观光景点，将苹果园升级成“苹果

游乐园”。

静宁县委书记王晓军告诉记者，“十二五”时期，静宁县完成建制村通畅工程1855公里，实现了所有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其中，2014年和2015年，共建成苹果产区通畅工程610公里。截至2015年年底，静宁县苹果总产量达68万吨，实现产值25亿元，苹果产业对于农民收入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全县已有15.4万贫困人口实现了稳定脱贫。

甘肃省交通运输厅总工程师杨惠林表示，截至“十二五”末，甘肃省农村公路达12.3万公里，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率达82%，贫困人口由692万人减少到417万人，交通对扶贫攻坚的带动作用显著。甘肃省将继续推进交通扶贫攻坚工作，明确到2017年实现100%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并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公路建设补助标准，加强农村公路安全防护和危桥改造，有序推进人口较多的撤并建制村硬化路。